

彼得·汉德克:

“我在观察、理解、感受、回忆、质问”

□韩瑞祥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 1942—) 被奉为当代奥地利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望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得了举世瞩目的声誉。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的经历以及青年时期在克恩州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放弃法律专业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外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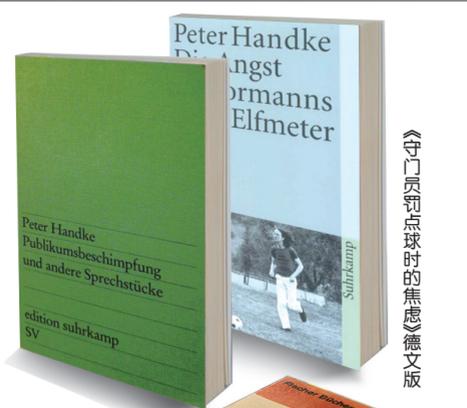
的影响。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重观》(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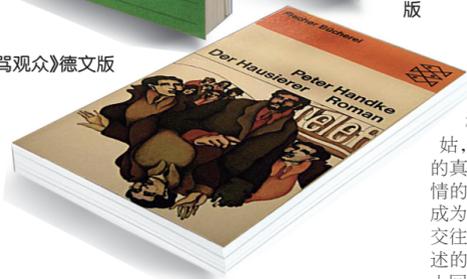
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动荡、南斯拉夫战争把居住在巴黎乡村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风口浪尖。从《梦幻者告别第九国度》(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如《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和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

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海涅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汉德克早期的小说与该时期的戏剧一样,都



《骂观众》德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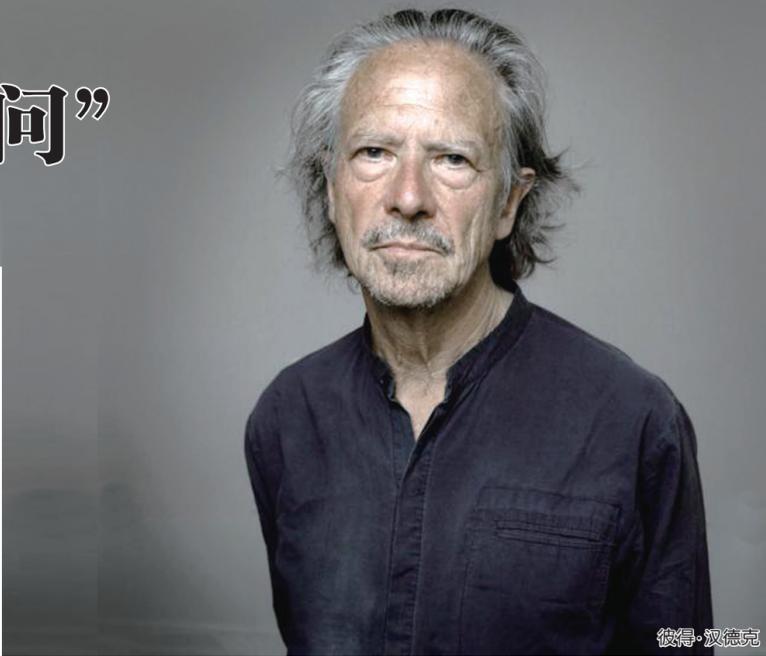


《推銷員》德文版

是其审美追求的大胆尝试,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叙述风格,改变了永恒的故事结构,形成了对象与语言、情感与语言和行为与语言之间无与伦比的叙述张力。作者在这里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感受在艺术表现中凝练成各种各样的生存危机,而每一个象征都深深地印证着这个时代的生存现实和人的精神状态,同样也留下了作者自白的蛛丝马迹。

短篇小说《监事会的欢迎词》是汉德克尝试其叙述风格的处女作。这篇小说已经没有了原本意义上短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所谓的欢迎词几乎是在毫无情节关联的描述中变成了对危机四伏的恐惧的独白。房梁的嘎嘎作响,暴风雪的肆虐、门卫儿子惨遭车祸的命运构成了欢迎词叙事话语的核心。这些情景在叙事结构中多层交织,相衬相映,象征性地表现出生存环境的悲凉与险恶,让人不寒而栗。叙述者“我”最终因此陷入了无言的境地,这也是留给读者思考的一把钥匙。

与之相比,《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虽然没有对危机和恐惧的强烈渲染,但却在冷静和深沉的叙述中让人深深地感到社会环



彼得·汉德克

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日常语言和修辞形式在这里表现为异变的亲情关系的象征。小说中,两个奥地利年轻人趁在西柏林逗留之际前往东柏林看望久未谋面的姑姑,可亲人之间的相见并没有出现惯常所期待的真情流露,几乎只有陌生的无言相对,缺少亲情的交流。整个叙述中,每个被感受到的物体都成为阻碍交流的象征,人物的失语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鸿沟。天气的寒冷与亲人的相见蕴含着叙述的深层结构。小说结尾时,两个年轻人没有赶上回程的末班车让人看到了对亲情的期待,而小说的标题则是作者留给读者去破解的叙述之谜。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和《推銷員》同样也是汉德克叙述风格的开山之作。尤其是《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一时走红德语文坛,而且很快就被搬上了银幕(1971年)。这两部小说都具有浓厚的侦探小说色彩,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划界界限。伴随着语言游戏式的叙述,单一的独白和意识流使得读者在描写语言与描写对象之间的巨大张力中感受着作品表现的内在。

《推銷員》是一部没有主线、情节和故事的小说,作者的意图也不是要写一部新型侦探小说。主人公推銷員观察着一切,记录着那一个个哪怕再微不足道的细节,他是无处不在的见证人。这部小说要表现的并不是这个主人公本身,而是“秩序与无序”的辩证交替。每个章节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叙述者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普遍意义上的综述和理论上的构建,介绍提要并加以议论。第二部分就是小说的描写,结构上呈现为句子的马赛克,相互之间似乎没有逻辑关联;对侦探情节只言片语的想象与逻辑上悖谬的荒唐断言相互交织在一起;精确的细节描写伴随着语言与事实的不协调。显而易见,这种叙事形式突破了迄今为止读者习以为常的小说叙事

模式,使其表现的可能性成为不可能。但小说所描写的绝不是随心所欲毫无关联的片段,叙事形式和视角的变化也改变了所要描写的事物。小说中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句子都会触及读者的心灵,使其不由自主地寻求在各个片段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这部小说既不是发生在洛杉矶或者西柏林,也不是发生在冬天或者夏天;只要读者读到它,它就会发生在读者的内心。”作者如此意在让读者在其中能够寻找到自己恐惧的现实故事,因为“每个句子都是一个故事”,会使人“回到现实中来”。

与《推銷員》相比,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没有章节之分,结构简单明了,尽管是第三人称叙述,可主人公的视角从头到尾占主导地位。主人公布洛赫是一个当年赫赫有名的守门员。一天早上,他莫名其妙地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以为自己被解雇了。他毫无目的地在维也纳游荡,偶然和电影院售票员格达有了一夜情,却无缘无故地掐死了她。他乘车来到边境上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匿起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令,最后驻足在一个守门员前,注视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扑住点球。这个凶杀案最终并没有结局,好像被遗忘了。在小说描写中,作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布洛赫越来越多地受到感知的困扰。布洛赫没有能力把周围的一个物体、一个人甚至自己的身体感受为一个整体。他从环境的每个细节中构想出一个针对他本人的痛苦暗示或者一个个给他设置的陷阱。这些构想又迫使他实施一个个人不可思议的、自己也无法控制的行为。布洛赫是一个困于生存现实中的病人,他的观察和感知是一个被迫追踪者的观察和感知。

小说渗透着汉德克的语言批判意识。像布洛赫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一样,语言与感知之间的危机始终伴随着小说的叙述。



尼古拉斯·周思

■瞭望台

尼古拉斯·周思: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

□李 尧

街》中有相当篇幅就是根据那位老人的日记和书信创作的。周思的祖父 Ivan Bede Jose 1893 年生于中国,在江南水乡度过了童年。所有这一切都对周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3 年周思来到中国,开始了“求学旅行”。从 1986 年到 1987 年,周思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了 18 个月,1987 年到 1990 年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他熟读中国历史,喜欢鲁迅、老舍、沈从文、郁达夫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对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学也都有涉猎。丁玲、吴祖光、王蒙、杨益、戴乃迭、冯至、谌容、叶辛等许多中国作家、艺术家都与他有过交往。周思真诚热情,充满活力,几十年来为中澳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提起周思,认识他的中国学者无不交口称赞。

1990 年 7 月,我翻译他的《长安大街》之后,到厦门大学参加“第二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周思一起参观了泉州久负盛名的开元寺以及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遗址,还参观了泉州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周思仔细观看每一件文物,每一张照片、每一份图表,及至走到建于明朝末年的巨大帆船残骸前时,他惊讶地停下脚步,向讲解员了解每一个细节。那时候,我只觉得身为作家的周思十分注意观察生活,全然没有想到这竟是他创作《黑玫瑰》的契机。

《黑玫瑰》由我翻译成中文后,周思专门写了序言。文中说:“访问泉州之后,这座位于中国南方福建省的城市的悠久历史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特别是许多个世纪以前,它就和西方世界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像马可·波罗这样著名的旅行家曾来这里造访,阿拉伯人也来这里做生意,甚至定居。我对泉州感兴趣,还因为中国旅行家就是从这里出发,探索世界,并且展示了他们高超的航海技术。此外,这一地区还流传着南明王朝许多有趣的故事,包括波及到台湾的复明运动。这种大海造成的影响——文化交叉是其中一部分——在许多方面都对现代生活发生着影响。”

“特别是我——一个澳大利亚人看来,东半球不同民族的成员和他们创造的文化相互影响,已经成了巨大的原动力和创造力。离开泉州,我就想,如果利用这些材料,把历史和想象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写一本当代读者感兴趣的小说。”

周思说:“我创作的灵感起始于一位朋友讲述的关于中国玫瑰和欧洲玫瑰第一次杂交的故事……早在 1789 年,人们在印度洋的一座小岛发现了一种玫瑰。这种玫瑰的颜色、形状和香味,都包含了欧洲玫瑰和中国玫瑰的特征……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种杂交玫瑰怎么会跑到那么远在天涯的海岛。我决定完成这个故事。我把故事背景放到 17 世纪中晚期,明朝末年。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和欧洲都颇具戏剧性。许多年前,我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仔细研究过这段历史。1649 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从而结束了他的统治。几乎同一时期,1644 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自缢自杀,清王朝开始统治,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我的这部小说不仅仅写了玫瑰的杂交,还写了人与人的汇合。一个跨文化的爱情故事在明亲王和一位英国姑娘之间展开。这两个年轻人十分奇妙地相互吸引,使一个新的生命得以诞生。”

《黑玫瑰》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反响,在澳大利亚很快销售一空。伦敦在 1995 年初就印了第二版。此后,这本书还被翻译成德文、法文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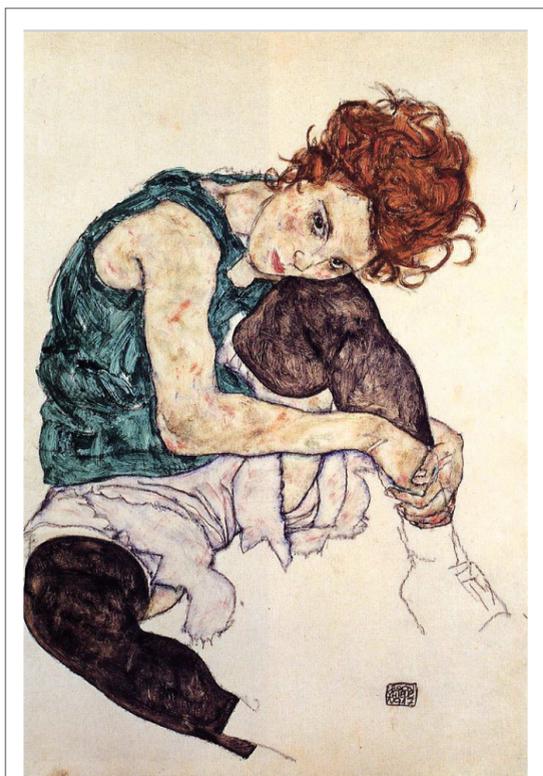
如果说《黑玫瑰》是为了表现不同文化冲突和融合而创作的话,《红线》对于周思、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更为重要。周思说:“这本书使我偿还了对我一生都具有特别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欠债’。这部作品就是 200 多年前中国作家沈复撰写的《浮生六记》。”

从某种意义上讲,《红线》脱胎于《浮生六记》。周思以佛教转世轮回的思想作为其创作的“理论根据”,利用沈复原著遗失的两卷提供的想象空间,间以现代派跨越时空的创作手法,使《浮生六记》的主人公沈复和芸在《红线》中转为博学正直的文物专家沈复灵和澳大利亚才华横溢的女画家鲁丝。这一对前世的恩爱夫妻,历经磨难和坎坷,今生再续前缘,演绎出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他们与歌星韩(《浮生六记》中的歌妓憨园)的感情纠葛,更使得这部小说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作者将一个古典的美丽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充满时代精神的人物结合得无懈可击、浑然天成,更显示出他炉火纯青的创作技巧。就这样,《红线》在过去与现在、事实与推测之间游戏,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成形。周思认为:“历史的幽灵可以再回来,浪漫的爱情故事可以再度重演。人们着手新的变革,包括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变革,下一章永远是谜。”

《红线》出版后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好评,至今许多英语国家的书店和图书馆仍然把它放在显著位置向读者推荐。《周日时报》认为,《红线》是“由一位一流的澳大利亚小说家创作的一个难忘的爱情故事”,“是一部充满微妙对比和优美笔触的小说”。

尼古拉斯·周思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的澳大利亚作家。他在为我翻译的《红线》写的序言中说:“在对沈复的著作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对跨越时空界限行走其间其他著作表示敬意。我想对中国作家表示敬意。他们像沈复一样,用自己的作品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感染我们。我特别感谢中国文学传统和它在当代世界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影响。”

为了扩大中国文学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尼古拉斯·周思一直关心、支持把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世界的事业,他自己也翻译过中国作家的作品。尼古拉斯·周思是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当之无愧。



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